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哲学社会科学(二十二)

孙中山研究论丛

第七集

1990·2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

D693.0
<15>

990663

孙中山研究论丛

第七集

目 录

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振兴

- 论孙中山的民族发展观 林家有(1)
- 从民权主义看孙中山思维方法的若干特点 袁伟时(18)
- 孙中山民权思想及其特征 丁文华(27)
- 论孙中山党政关系思想的演变 鲁广锦(23)
- 孙中山的理想与 NICs 的现代化实践
- 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比较 乐 正(40)
- 吸取、融贯、创新——略论孙中山与中西文化的关系 周兴梁(56)
- 试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文化取向 彭 鹏(65)
- 略论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 李吉奎(77)
- 试论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 桑 兵(89)
-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 邱 捷(101)
- 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孙文的资料
- 森恪关于“满洲问题”的书信 [日]藤井昇三(118)
- 辛亥革命时期在日华侨敢死队 [日]松本武彦(127)
- 孙中山与山东问题
- 兼探孙中山的对日观 段云章(135)
- 孙中山与宋家交往中若干史实考析 余齐昭(153)
- 华侨支持孙中山反对军阀、统一中国的斗争 郭景荣(158)
- 1923年大本营重建前后孙中山与驻粤海军 汤锐祥(171)
-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孙中山
- 思想的变化与发展 [日]山田辰雄(180)
- 黄埔军校宣传出版活动述略 金炳亮(204)
- 《孙中山全集》未收录的一批佚文(辑自广州《民国日报》影印本) 黄国建 黄增章辑注(213)

徐州师院图书馆



22202959

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振兴

——论孙中山的民族发展观

林家有

在亚洲的东部有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

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50多个民族的总称。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孙中山有过许多论述,他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研究孙中山的民族发展观,回顾和总结孙中山当年对民族发展所提出的许多见解,对于我们今天振兴中华民族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孙中山的民族发展观是他的民族观的组成部分。关于孙中山的民族观比较复杂,本文不作专门论列,只是在谈到他的民族发展观时略有论及。探讨孙中山的民族发展观主要是介绍和评述他发展中华民族的观点和主张。我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和评述如有不妥,盼望学者同仁批评指正。

(一)

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我们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①。这个批评听起来有点不顺耳,但它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人应该重视对自己的研究。中国是我们的故乡,中华民族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并不陌生。然而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都十分了解呢?还不能作如是说。有一些人对自己的中华民族是很不了解的,不仅不了解她的过去,也不了解她的现在。因此,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些情况的出现,不仅会影响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看法,也会妨碍我们走好强国之路。

研究自己,了解自己,也是为了研究别人,了解别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也就不可能正确地了解别人、认识别人。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首先要了解和认识我们的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看法历来不一。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是世界上一个优秀的民族;一种是认为中华民族经济文化落后、人口素质差、民族素质差,“百事不如人”。持前一种看法者,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很自豪;持后一种观点者,却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压抑、不那么光彩。孙中山通过对自己民族的研究,认为中华民族不是“一切不如人”,当然也不是一切都优于人。他针对“一切不如人”(或称“百事不如人”,不如人就是不如西方)的论调,将中华民族跟欧美民族作比较时明确指出:尽管近代中国的物质文明落后了,但并不是中国“百事不如人”,我们中国比外国强的地方也不少。他说:中国人一旦能将独立、民主的法制建立起来,中国比“米国(即美国)还要强几分的”。何以见之?孙中山说:因为“米

① 《鲁迅全集》,第3卷,第333页。

国无此好基础”。就是西欧的英、法、德、意也不能跟中国相比。又说：日本近几十年有很大发展，但“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米国土地虽有清国版图之大，而人口不过八千万”，“英国不过区区海上三岛，其余都是星散的属地”，“德、法、意诸国虽称强于欧西，土地人口均不如我中国”，俄国“土地虽大于我，人口终不如我。”总之，“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① 中国土地辽阔，“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亦为世界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②。所以，孙中山说：中华民族是“文明优秀之民族”、“世界至大之民族”，它的“聪明强力，超绝等伦”^③，常以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④。我们中国不仅古代就有“很好的政治哲学”^⑤，而且从前中国人的能力也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印刷术、磁石、火药都是中国最早发明和利用的。“至若人类所享衣食住行种种设备，也是我们从前发明的”。比如饮料茶叶、丝织品，就是中国几千年前发明的。还有造房屋的原理和房屋各重要部分都是中国人发明的，比如拱门就是以中国的发明为最早。至于走路，外国人现在所用的吊桥，外国人“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于中国。”^⑥ 由此，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⑦。由此可见，孙中山发思古之幽情不是为了玩古。他肯定中华民族就是肯定中国。肯定中国，不是要人们背上中国伟大的精神负担，而是为了树立民族的自信心，要全国人民下决心赶超欧美，“跟上世界的潮流”，做到“后来者居上”。

中华民族既往的文明成就，只能说明过去中国人民的生活历程。说明中华民族有光明，也有黑暗，有智慧，也有愚昧，有精华，也有糟粕，有伟大，也有不伟大。总之，对待我们民族过去曾经产生过的生动活泼万千景象，不能只是陶醉，只言进步、成就、精华，无视落后、愚昧、糟粕等不良影响。对于中华民族的不足和缺点，不但要指出来，而且还要及时纠正和克服，才能促使民族进步。孙中山说：因为“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⑧。在专制权威下形成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⑨。加上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使得中国一些地区人民的知识水平比“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⑩。由于我们中国人文化落后，“修身的功夫太缺乏”，也曾出现过一些“野蛮陋劣”、“鄙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5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第250—251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第250—251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⑧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1页。

⑨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01页。

⑩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9页。

陋行为”^①，但是孙中山认为，中国落后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是可以改变的，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自信、民族精神不振。因此，他警告中国人说：中国虽然比起西方强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我们民族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还不少，但“国事只靠我们自己努力，不关外人帮助不帮助”，我们中国并不缺乏人才，“只因我们失却自信，故效果少见”^②。我们“中国人口有四万万”，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为甚么我们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呢？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自振作”^③。如果我们不振作民族精神，“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④因此，孙中山指出：要恢复我们的国际地位，首先要恢复我们的民族精神。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向前去奋斗”^⑤，中华民族的振兴还是很有希望的，如果中国人不自振作，中国的事中国人不解决，“全靠外人提倡”，“中国便事事落后在人尾，永远不能自己发达，永远没有进步。推其极端，中国便非沦于灭亡不可”^⑥。孙中山这些言论，无非是要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要有个正确的看法。不要肯定我们的一切，也不要否定我们的一切，既不要骄傲自满，也不要自暴自弃。这是孙中山关怀中华民族发展的肺腑之言。

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是，看到我们民族的一些毛病，就认为是不治之症，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看法要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这就是实事求是。不是从事实出发，一切都无从谈起；没有服从事实，服从真理的态度，也说不到一起。试想，如果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的没有前途的民族，她根本就不可能历久而不衰，几千年于兹，历经世道苍桑和人间种种疾苦，她还是蓬勃生机，向前发展。然而，我们中华民族也不是一切都比其他民族好，因此，指出她的不足和缺点，以便在发展中加以改造，熔铸新的民族性，创造和发展新的文明业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要知道，否定中华民族过去和现在太多太过，岂不是连自己生长和前进的基地都被否定了吗？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孙中山之所以伟大，一方面是由于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民族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革命和建设纲领，并为此领导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次是由于他高瞻远瞩，他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潜存的许多发展的优势，又看到了中华民族潜伏的危机因素，因此，他总是告诫人民：中华民族“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还是睡觉，不去奋斗，不知道恢复国家的地位，从此以后便要亡国灭种。”^⑦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充满信心和乐观情绪，但他对中华民族也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就是由他的民族观所决定的。孙中山是中国新旧时代、新旧民主革命交替时期的过渡性人物，他的民族观也充满过渡性人物对民族发展新旧两种观念的相互制约。他根据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特点，以及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并由于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受外国侵略、欺凌所形成的自卑、缺乏自信和由害怕外国侵夺采用闭关、自我封锁政策，造成的盲目自大、深藏固拒的民族心态，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看法是喜忧参半，因此，他在寻求中国政治变革中，在探索中国民族复兴的因果关系时，他既充满着对古老中华民族的深深留恋，又充满着复兴中华民族和树立一种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1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20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9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40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35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2页。

新的“国民性格”的信心。但是,当他看到中华民族,由于“欧风东渐”,遭受到政治、经济、人口等几方面的压力和中国不自振作,民族精神衰退的情况时,他又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焦虑和忧患。表面上看,孙中山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眼光,他在谈论中华民族危机的现象中,总爱从历史上的中国同当今的中国比较,从中国与外国比较;然而由于他只是着重于从中外文化、古今文明中作情感的判断或逻辑的判断,缺乏历史的判断,因此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又缺乏明确的时代选择。所以,孙中山的民族发展观,建立在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基础之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是他的爱国主义和时代觉醒的产物,但也充满矛盾。他的民族观既反映他对严酷的环境和历史现实对中国所造成的危机感同振兴中华的紧迫感的最终融合,预感到中华民族必须及时奋起,迅速赶上时代的潮流才能恢复和保持在世界民族中的应有地位;也反映了他的民族发展观带有对时代性的排解,没有能够指明中华民族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发展,最终走向何方。

(二)

民族的发展应体现在各个方面,但主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即民族经济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不是孤立的问题,它有赖于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也有赖于生产关系的作用,即有赖于各种制度的完善,政策的促进,以及经营得当等因素。对于中国来说,进行一场工业革命,经过与英国同样的历史进程来使自己的民族经济发展,变成一个强国简直是不可能的。中国也不能完全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来实现自己民族经济的发展。所以,孙中山主张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借助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资金走民族独立的经济发展道路。他认为,一个民族只有政治上的独立,民族才能真正独立。也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保证政治上的自由。

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就指出: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后,就“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①,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因为经济问题受到政治问题的制约,所以经济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治问题的解决。孙中山说:他领导的“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单纯的政治性质,而不是经济的性质。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②。“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③,在“令中国大富”^④。

为中华民族求富,这不仅是孙中山的理想,也是近代中国一切先进的中国人的理想,然而孙中山的“求富”观跟近代许多政治家和经济思想家单纯追求的“国富民强”的目标不同。孙中山的所谓“大富”,就是中国人普遍的“富”,不是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也不是“国富民穷”。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患贫”,“贫穷就是我们的痛苦”,因此,他主张“发财主义”。但是“发财”不只是少数人之富而大多数人贫困,而是要在民族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应该使人民得到实利。而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其国家很富强,但有些平民却很贫困,贫与富的差别很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9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

页936,卷8,《孙中山全集》②

页605,卷9,《孙中山全集》①

页013,卷8,《孙中山全集》③

页282,卷8,《孙中山全集》⑥

页225,卷9,《孙中山全集》⑤

大,这不是国家的真正富,至少不是我们中国所追求的富。所以,他尖锐地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①孙中山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认识不清,故他以发展民族经济,避免人民贫困,作为避免“第二次革命”,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手段,充分表明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对西方世界空前的“物质文明”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对这种“物质文明”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他又忧心忡忡;一方面,他目睹“其民实困”之后,对受压迫受剥削的平民深表同情,从而联想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对“第二次之革命”又抱反对和否定的态度,希望通过某些改革,避免各种社会弊端,“毕其功于一役”。就实际意义上来讲,孙中山是“希望用一种理想化的资本主义来取代当今实际存在着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②,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在孙中山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国家强盛,其民实困的怪现象,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了,从而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有数的经济强国,但是由于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不公平则制造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分配上的不合理、不公平又反映在“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标”,不是以解决社会福利为目的。因此,孙中山主张发展民族经济要“以养民为目标,不以赚钱为目标”^③。为了实现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经济主张,孙中山提倡发展民族经济要避免社会财富为少数人所得而私,而必须切切实实地解决人民关切的“食、衣、住、行”四件大事。通过对人民办实事,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建设上来,上下一致来解决“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④等社会问题,做到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孙中山这些思想主张,在他晚年的民生主义演讲中,作了具体细致的阐述^⑤。

孙中山认为,要发展民族经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关键不是在于提出什么理论和主张,重要的是办法。中国的出路在振兴实业。“实业不振,商战失败”,“外货之入口超于土货之出口”,“此为最大漏卮”。如果无法弥补这漏卮,“遂至民穷财尽,举国枯竭”^⑥,中华民族的前途则不堪设想。所以,振兴实业是振兴中华的首要任务。“中国宝藏至富,甲于世界,开发振兴,中国必强。”并为此他制订了一整套振兴实业的详细计划,提出了明确的实施办法。

孙中山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和主张,充分反映了他奋发图强、建设国家的决心,不仅表明孙中山渴望把封建主义旧中国改造成为近代文明国家的宏伟抱负;而且也体现了孙中山把发展民族事业,振兴中华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治国主张和爱国主义思想。孙中山为祖国,为民族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的“理想和主义都是客观情形的反映”^⑦。他的经济建设主张和实业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主要问题不在于他的思想、主张和计划本身,而在于孙中山想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289页。

② 张启承、郭志坤:《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80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10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

⑤ 具体内容参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426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3页。

⑦ 《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5页。

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反对中国走向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道路,孙中山无法在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加上计划经济必须由执政的政府来实施,但孙中山不是统一的政府的领袖,他不具备实施经济建设计划的条件。正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孙中山根本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去实施各种建设计划,致使孙中山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无法实现,但他留下的思想和经验教训则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借鉴。

(一)振兴实业,振兴中华,首先要振兴科学。

孙中山说:“学向为立国根本”,要振兴中华,必须“普及教育,提倡科学”,要“将民国造成一极乐之世界,非国民有充足之知识不为功。”^①“今日文明已进于科学时代,凡有兴作,必先求知而后从事于行,则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②但是孙中山也并不认为只要有知识就能救国,要救国必须要有理想,要有革命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行动。孙中山以革命作为救国的第一步,这同“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论者的主张都不同。所以孙中山同急功近利者显然不同。在19世纪末,我国一些爱国知识分子鉴于清政府的腐败致使中国对外战争失败、丧国辱国,他们为了救国曾经设想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科学技术建设军事民用工厂,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20世纪初年,在我国知识界又出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号。可是,他们只是从救危的眼前利益去谈救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去考虑救治国家、民族。所以,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与孙先生同时代的人只求近功,不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症结所在,希望不必根据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科学等所得的知识,就把事情办好,更不愿根据科学知识来订定国家的建设计划。因此他们诬蔑孙先生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他们的‘现实的’眼光根本看不到远大的问题,更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缺点就是无知和浅见,缺乏实际能力倒在其次。以实在而论,他们自己认为知道的东西,实只限于浅薄的个人经验或不过根据一种常识的推断。这样的知识虽然容易获得,但以此为实践基础反常常会遭受最后的失败。”^③由于孙中山深知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加上他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具有远大的眼光,所以他深感到有超越急功近利的必要。他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前途着想,指出要学西方先进民族的长处,来提高我们民族的科学水平,全面发展民族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使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立于永远不败之地。他在晚年作民族主义讲演时,反反复复地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民族比较,指出: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截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吸取外国科学弥补国家民族之缺失,作为中国发展的基础,中华民族才能与世界先进民族并驾齐驱。但他从不认为,只盲目地将外国的科学知识、政治思想搬运到中国,中国就能同人家并驾齐驱。关键是学习外国对中国有用的东西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科学水平,用我们的智慧去建设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人家提倡、靠人家摆布。他说:我们东方有个岛国日本,他们的民族叫做大和民族,他们“乘欧化东渐,在欧风美雨中,利用科学新法发展国家,维新五十年,便成现在亚洲最强盛的国家,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欧美人不敢轻视”。“因为日本人能学欧洲,所以维新之后便赶上欧洲,……可知,白人所能做的事,日本人也可以做,……日本人能够学欧洲,便知我们能够学日本。我们可以学到象日本,也可知将来可以学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3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2页。

③ 蒋梦麟著:《西潮》,香港磨剑堂1960年版,第118页。

到像欧洲。”^①日本学欧洲,中国学日本,学些什么呢?孙中山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因为他们近来的物质文明很发达,所以关于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种种设备,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关于海陆军的种种武器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这些新设备和新武器,都是由于科学昌明而来的。……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②。因此,他要求我们学习外国不要盲目地统统拿过来,而主要的是学习别人先进的科学,来振兴我们民族的经济,发展我们民族的科学文化,培养我们时代的新人。既然我们中华民族不是“百事不如人”,也就用不着全靠外国人输入文明。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对岭南大学学生发表演说时就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现在的文明,都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全靠外人提倡,这是几千年以来从古没有的大耻辱。”^③他还以中国派留学生到美国学习为例,指出有的留学生“到了美国,只要学成美国人一样便够了。所以他们在外国的时候,便自称为‘佐治’、‘维康’、‘查理’,连中国的姓名也不要。回国以后,不徒是和中国的饮食起居,不能合宜,就是中国的话也不会讲。所以住不许久,便厌弃中国,仍然回到美国。”对于这种“只要自己变成美国人,不管国家”的人,孙中山说他们忘了为什么要学习外国的根本问题^④。因此,孙中山反对事事仿效外国。他说:“中国从前是守旧的,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⑤,结果因为跟中国国情不合,效果也甚微。孙中山批评对于外国的文明只求拿过来的人是不了解中国文明,也不了解外国文明。尤其是不了解西方文明。

中国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有什么不同呢?1919年孙中山出版《孙文学说》一书,他在书中就“知难行易”学说作阐述时,指出:中西文化不同之一就是中国人重应用,而西洋人重理知。中国重实际,所以常常过份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困难,有时是实在的困难,有时只是想像的困难,以致忽视实际问题背后原理原则。所以,中国多出实际家,少出理论家。在文明进步,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实际家,更需要理论家,因为理论家不仅可以通过他们的理论成果来提高民族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思辨能力,更不可能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这样不仅国家落后的面貌改变不了,由于国民素质差不懂得革命和建设的道理,也就不可能求革命和建设成功。所以他说:这样下去,中国只有革命造成的破坏,无建设的成就。这种情况不改变,“而国治民福永无可达之期也。”^⑥孙中山在这本书中重点论述的问题就是要中国改变“知易行难”传统文化心理结构,通过文化的创新造就中国新型的文明,树立新思维,以求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

振兴科学,首先要振兴教育。教育不发达,培养不出科学人才,不仅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学不成,振兴中华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孙中山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认为,学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9—19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35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38—539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6—317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4—215页。

校为“文明进化之泉源”，所以他动员全社会都来重视办学，强调要因陋就简普及教育。他说：办学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办学为“富国之大经。”“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事须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①他认为，中国的复兴在于人才的培养，在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办教育和发展经济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要实行普及教育，必须经济上有相当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发展又得靠教育，因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知识，而“要有知识，就要有教育。”^②“教育进步，以政治为基础”。政治不改良，“无论如何提倡教育亦不为功”^③。

孙中山所谈到的这一些，都是他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反映，也是客观历史的反映。历史证明，孙中山的看法和主张很有参考价值。

（二）振兴科学、振兴教育，必须正确地处理好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

孙中山是一位很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政治家。他热爱中华民族，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他并不是盲目地维护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他反对中华民族自我封闭，主张对外开放，提倡文化交流；但他也反对唯西洋人至上、无知盲从。他经常强调，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明发展史，在与世界民族接触中，要自觉地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正确地对待一切外来的先进文明来正视和改变自己的落后状态。在建设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时，他反对顽固国粹论，也反对将外来文化盲目向中国搬运。他主张外来文化“中国化”，反对中国全盘西化。持“全盘西化”观点的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得一无是处，认为中国文化的任何特质都没有生存的余地，只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不问其是否合理，一概排斥；反之，对西方文化，则不问其优劣，一概全盘接受。这是一种极端片面性的认识。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而没有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涉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因素互相作用的一个极复杂、多层次、多侧面的历史过程。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的传统象破布一样扔弃。英、法、德、日在走向现代化时，也都对本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番改造和吸取，并没有对本民族的传统全盘否定^④。

中国是否要学西方？如何学？从来争论很多。应当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也是长期来有争论的问题。孙中山主张向西方学习，而且他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只有学习西方振兴科学，振兴教育，全力发展生产，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强盛的理想。但他并不认为，学习外来文化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认为西化就等于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封建传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繁重负担，我们应该卸下这个负担。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形成中华民族特点的重要部分，完全丢掉传统文化，也就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所以，要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1939年10月，嵇文甫在一篇《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文中讲的道理，虽然不是就研究孙中山的思想而发的，但他所讲的意见，我认为大部分同孙中山的看法是吻合的。他说：“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把世界上进步的学术文化尽量吸收，使自己迅速壮大起来。然而我们有自己的社会机构，有

① 上海《民立报》，1921年5月13日。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7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65页。

④ 茅家琦主编：《台湾30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

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不是可以随便安上美国的头,英国的脚,要方就方,要圆就圆的。世界上任何好的东西,总须经过我们的咀嚼消化,融合到我们的血肉机体中,然后对于我们方为有用。我们不能象填鸭似地,把外边的东西尽管往自己肚里硬填,不能象小儿学舌似地,专去背诵旁人的言语,我们要‘中国化’,要适应着自己的需要,把世界上许多好东西都融化成自己的。”他说:所谓“中国化”自然不同于顽固的国粹论。因为照国粹派的想法,什么都是中国的好,一切都用中国固有的。“中国化”的含义,“当然是说把本非中国的东西化成中国的,它是以吸收外来文化为其前题条件的。它所反对的,只是不顾自己的需要,不适应自己的消化能力,不和自己固有的东西有机地联系起来;而只把外来文化机械地、生吞活剥地,往里面搬运。”所以,他说: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就不能实行文化上的排外主义。我们只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地上进行“中国化”,并不能关起门来,把中国自己的东西再来“中国化”。“中国化不仅不排斥外来文化,而且恰好相反,非吸收外来文化也就根本无所谓“中国化。”“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①。这段话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解释得很实在,而且也把中国的现代化同外来文化的“中国化”问题讲活了。

谈到文化,人们都知道,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也有时以科学文化为主(开放时期),有时以民族文化为主(封闭时期);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也不能只有人文文化(或民族文化)而没有科学文化。我们中华民族要振兴、要繁荣发展,也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科学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要么是国粹主义,要么是拿来主义,都反映我们的片面性和盲目性。所以,孙中山清醒地指出:我们中国要进步,民族要发展,必须要有正当的学术活动和正当的思想,“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由于学术思想和活动不正常,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能作认真的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因此造成有时候“中国不信外国”,有时候“外国不信中国”^②,这种反复,不仅误了中国,也误了学者。孙中山说:只要我们稍为留意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外国的文化也不是一切都好。“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但是外国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样呢?外国的政治哲学和物质科学两种学问的进步,又是哪一种最快呢?政治的进步远不及科学。”^③所以,我们要学习人家的科学,不要盲目地学习外国的政治和哲学。学习外国的科学也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振兴中华,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外国。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许多许多我们今天仍引以为自豪的文明业绩。

然而,我们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也遭受过种种挫折。但挫折并非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或者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而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孙中山说:我们中华民族“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主要是由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维方式横梗其中,对事物缺乏深入研究,凭肤浅的一知半解和主观意志行事。因此孙中山批判了古代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片面观点,又批判了“离行而谈知”的“良知”学说,

① 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39年10月)。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70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7页。

创立了“知行”、“学用”和“言行”统一的学说,发展了我国古代知行观中的真理部分。他说:只要能了解他的知行统一学说并用于实践,“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技耳。”^①由于我们不善于把握有利时机,在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过程中,及时地将我们民族文化的开放性、独立性、自觉性、坚韧性,以及创造力、创新力、凝聚力和恢复能力有机地融合起来,正确地认识我们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制定出相应的可行措施。因而,我们在文化交流中,在吸收外来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思辨、融汇过程中,就容易产生片面性,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国粹化”,总是在两个极端中徘徊,既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又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关系。孙中山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没有能够解决好。主要原因是孙中山未能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孙中山为了摆脱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束缚,有寻求文化创新与改革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新素质联系起来的设想,但由于孙中山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他的注意力不得不放在解决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这个近代中国的主题上,因此反帝与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便发生尖锐矛盾。又由于孙中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思想启蒙和妨碍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这样的结果又阻碍了他对近代中国思想主题的深入认识,因此他不能正确地处理好救国反帝解除民族危机与同吸收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的关系。对于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发展中华民族经济、科学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关系,孙中山也无力解决。

第二,孙中山把解救民族危机进行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采用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外部运动的方式,而是表现为对内的民族运动,认为复兴中国的障碍先是清政府,后是北洋政府。他虽认为“非革命不足以救国”,但是革命与保留传统文化的关系怎么样?孙中山虽然强调要树立新思想、新观念,但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同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关系怎么样?批判封建思想文化同维护民族优良传统的关系又怎么样?孙中山不仅认识不清,也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由于思想的局限,孙中山又没有能够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动态系统的把握与分析中去区分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优点与缺点,从而根据时代的要求,破除传统文化的弊端,发扬民族文化的活力,将继承优良传统同向西方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促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更新,使中国文化向现代化形态转变。因此,孙中山没有能够明确解决中华民族的发展除了经济繁荣外,文化的结构和新思想、新观念应该如何树立,最终应走向何方等重大问题。

(三)

民族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民族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民族素质的提高与民族精神的振兴。顾此失彼,或重此轻彼都会造成民族的畸形发展,给民族事业带来失误,留下社会后患。孙中山民族发展观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把民族的发展繁荣同民族精神的振兴有机地统一起来,强调用“民族精神救国”。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9页。

何谓民族精神?

关于精神,孙中山曾作过解释:“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比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之精神为之。二者相辅,不可分离,若猝然丧失精神,官骸虽具,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失,而体亦即成为死物矣。由是观之,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人类而失精神,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孙中山说:物质与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①孙中山从人的物质之体和精神之用的结合过程中,以“体”和“用”的对立统一来比喻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说明孙中山坚持唯物主义观点。但他又说“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②,过分夸大精神作用。民族精神是民族物质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的直接产物,如民族社会心理、民族风俗习惯、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理论、哲学、宗教等等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组织机构,都属于民族精神的内容。它主要表明在由物质生产决定的精神生产活动中,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认识、掌握和改造世界的创造力量的表现程度和发展程度^③。

民族精神是在民族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包含有强烈的时代性,时代不同了,民族精神的内容也会不同,但是只要是民族精神它必然有继承性,又有创造性,而且因为民族精神是民族优秀文明的结晶,它又必然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任何民族、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强调发扬民族精神,但是无论什么民族也不能只强调精神的力量,忽视物质的力量。民族精神的振兴是一个综合的发展过程,它有赖于精神的力量,更有赖于物质的力量。精神的东西既然产生于物质,它就只能是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发展,它不可能仅仅依靠精神本身力量来提高和发展。

民族的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制约着民族成员的观念和意识。中华民族有许多优良的品质,但由于受到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自然经济和封建意识造成的心理、意识、思想的严重影响,也必然存在着某些不良习性。但民族精神既然是民族的优良传统,它就不可能是民族不良习性或丑陋习性的结晶。所以,任何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民族精神,一个民族只要民族精神丧失,它就会失去自尊、自信,就必然会涣散并最后解体。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世界存在两种现象:一是物质现象,一是精神现象。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意识和存在,观念和物质是对立统一、互相作用的关系。毛泽东说过:“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④即是说社会意识必须与社会存在相适应,但社会意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孙中山承认物质存在决定精神,因此他虽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但不能说他是唯意志论者,更不能说他是唯心主义者。

民族精神,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政治文化土壤,成为一种巨大的力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2—1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3页。

③ 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④ 《毛泽东选集》,四卷横排合订本,第300—301页。

量。所以,一个民族要振兴、要发展,除了政局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外,必须要发扬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1923年12月,李大钊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千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①可见,民族精神的力量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在民族遇到艰难困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孙中山说:在民族危机的年代,拯救民族要发扬民族精神,“要用精神来救国”^②。抵抗外国侵略的积极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在振兴经济、文化的年代,更需要振兴和发扬民族精神,国家一天退步一天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精神”。孙中山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③唤醒国民就是振起爱国的热情,“恢复辛亥革命时代之民气”^④。

“辛亥革命时代之民气”,就是爱国革命的精神。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推翻清朝统治的民族革命意识,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意识,一是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的富国富民意识。实质上,三者反映了中华民族要求革命、独立和民主、富强的意识。这种意识揭示了近代中国思想的主题,即解除民族的危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

解除民族危机,加速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近代中国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靠的是什么呢?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艰苦地探索着。孙中山从革命之初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也无从解决,而要解决政治问题只是“假借武力”还不行,还必须认识到改造人的重要性和艰难性。因此,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深感到宣传革命理论和学说的重要性,提出了知行统一学说。他告诉人们,辛亥革命的失败,不在于民权、民生主义有没有实行,而在于人们民族情绪的极度膨胀,变成了盲目的反对异族统治的行动。清政府推翻后,旧的思想、旧的意识未能改造,使民族革命的成果未能换来全民族思想的更新。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的旧思想、旧意识,树立新思想、新意识的新课题。

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唤起民众。孙中山认识到,科学知识是力量,而愚昧无知也是力量,有时是更可怕的力量。因此,孙中山非常重视从事艰苦细致的启蒙教民工作,与群众的落后意识及传统的落后习惯斗争。提出要改造“国人社会心里”,进行“心理建设”。他指出:“中国习俗去古已远,暮气太深,顾虑之念,畏难之心,较新进文明之人为尤甚”,并同日本比较,说:“日本之维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国之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故日本之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亦无其期也。”所以,孙中山说,他写《孙文学说》“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并指出:“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

①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1—242页。

④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8月4日。

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乃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尤为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果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①孙中山说:中国人不改变畏难保守,对什么事都不敢为、不懂得为和“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的保守和自我封闭性,中国的独立和民主就没有希望,国家的建设和民族的振兴也没有希望。因此,孙中山看到了做学说,广宣传,破“国民心里之大敌”,“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的重要性。说明孙中山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开始意识到任何一场革命首先都是一场思想意识的较量。思想意识的斗争是一个牵动全社会的斗争,思想的真理能够战胜谬误,就是因为真理代表正义者的利益,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能够动员人民去战斗。所以,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几乎是所有爱国者都重视思想舆论,强调要发扬民族的精神。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就必须恢复民族精神,到了民族精神恢复以后,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但是,由于每个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解不同,因此所作的概括也不一样。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者认为“民族精神所由发现者有二:其一曰由历史而发生者也,其二曰由土地而发生者也……故言民族之精神,则以知民族之历史与其土地之关系为第一义,而后可以进而言生存竞争之理。”因此,他们认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则表现为“坚忍不拔之操,勤奋奋励之气”^②。孙中山则认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则是“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所谓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忠孝,“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有四万万人去效忠。”^③所谓固有的知识,孙中山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因为“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④。孙中山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的“固有的道德”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固有的知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重人伦、重道德,提倡人格的自我完善,致力于人际关系的统一和谐。格物、致知是认知的来源,诚意是内省的起点,“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修身是完善道德的根本。这种与民族文化心态相融合的政治伦理意识,一旦进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便影响和引导着人们,按照封建礼教修身,约束个人的思想行为,在完善道德修养中求得进取和发展^⑤。显然,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保守性。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指出:孙中山为了达到他的治国建国目的所采取的途径,作成一定的程式,就是“他要把新的有用的东西和旧的好的东西混成一起,这就是说保守的与革命的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8—199页。

② 《民族精神论》,《江苏》第7、8期连载。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244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

⑤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48页。

进步的合而为一。在这个大杂汇当中,所谓保守的,就是中国的来源,这就是“无为”的精神,也就是说,任其自生自灭,顺天之道,亦即是亘古不易之“道”,对于革命前进的态度,孙中山多得力于欧美思想界,他的晚年又加上苏俄的影响。“他的一生,吸收了很多的新的东西,但是他永远是中国人”。因此,孙中山的革命观虽多接近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意志则是道地的‘中国式’”^①。也有人指出:孙中山的学说是“秉承了中国文化优良的传统,吸取了西方世界进步的思想与制度,加以融会贯通,而树立了一项人类和谐相处的崇高理想和目标。”^②他“将东方孔子学说和西方学说融贯,超越中国国界,而谋世界人类的幸福”^③。

我们应当承认,孙中山将中国“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看作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带有保守的倾向,但他并不复古,因为他要革命,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表面上看,孙中山的学说的核心是民主共和,这是学西方的。但他的精神基础又是旧的传统,这是中国固有的。这不是矛盾了吗?在充满矛盾的时代和社会里,人们的思想也必然充满矛盾。孙中山也同样。但我们作细一层的考察便发现,孙中山的目的是要使“有用的新的”与“好的旧的”联合起来。使新与旧调和,更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新旧时代变化的需要。

孙中山在研究人类思想不断变化过程中,发现“凡在同一文化之下,孕育的各分子,容易养成共同的精神。故凡以民族文化传递于下一代,实为统一民族的必经途径。”^④他告诉人们修身的道理,以及应如何迁善去恶,目的是在唤起新民族意识,促使他们的团结,使他们觉悟中国情形的特殊,鼓励人民对国家尽忠;并要中华民族保留强烈的民族意识培育对外求生存的力量,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孙中山要维持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固有的知识”,而在于如何地认识和解释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固有的知识”。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特质和优良文化传统的反映,它涉及民族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重内容,必须要从特定民族的精神心态和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的确定模式等方面去总结和探索,才能正确地总结民族精神,显然孙中山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他没有能够就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作出科学的概括,也没有能就中华民族的性格、气质作出科学的结论。

中华民族具有哪些特质?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去谈继承和发扬。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不能正确地继承,也不能健康地发展。

过去我们以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质来概括,这个概括是正确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长期成长进步过程中形成的特质,但显然又是不全面的,因为一个民族只是刻苦耐劳,不豁达乐观,不追逐利益,没有创造力、创新力、凝聚力;只酷爱自由没有抗争精神和刚毅顽强的民族性格,就容易守旧不进,守旧保守不奋进,民族就不可能繁荣发展,也就算不上是优秀民族。

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都是这个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什么叫做传统?传统有世代相继之义。传统在现代意义上是英文 tradition 的汉译,是指由历史沿传下来的、经过人们选

① [联邦德国]海法特(H. Herrfahrdt)著,王家鸿译:《孙中山传》,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65—66页。

②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主编:《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3年版,第4—5页。

③ 蒋一安主编:《中山学术论集》,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1页。

④ 吴鼎著:《民族主义与中国伦理》,台北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48页。

择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思想、道德、风俗、心态、艺术、制度等,是一个外延最宽,反映客观事物最一般规定性的概念^①。传统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落后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其作用“是消极的”^②。这些落后的传统,自然要感染人民群众。进步的传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其作用是积极的。所以,对传统要进行科学分析,不能认为凡是民族过去的东西,或者过去留传下来的东西就是传统。也不能认为凡是传统都是进步的、积极的或者说是好的;也不能认为凡是传统都是落后的、消极的,或者说是坏的。从民族学的意义上看,世界各个民族各有其传统。它包含着各民族的文化、思想、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传统以及文字传统等要素。传统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内容和关系网络。既然传统是从历史上得到的,并经过选择的这样一种东西。当然好的、坏的、进步的、落后的都会传下来,人们选择也有好的,有坏的,有积极的,有消极的,因此,传统就是各种文化类型里面的基本核心,或核心精神。

对于民族传统,有人认为“习惯存,则民族之精神存”^③。也有人说:传统已成为传统,自有它的价值,而且也有它的外在根据,“作为传统,固然带有蚀痕斑斑的时代烙印,但也饱含根深叶茂的民族精神;而且,在其时代性的品格中,又潜藏着永久性的因素,在其民族性的品格中,还包容着人类性的成份”^④。也有人认为,传统就是意味着过去,意味着保守,就是坏事。因此他们要“彻底和传统决裂”。见“传统”就骂,这未免过于简单。有的人将中国社会中一些坏的现象,都归罪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他们错误地认为,传统“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我们要走向工业化,就得吞下‘今不如昔’、‘世风日下’这颗苦药丸。下定决心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它一切都是不实际的。”^⑤其弦外之音,取代“传统”的东西自然就是西方的东西。这种完全鄙弃自己民族的文化而崇尚他人文化的倾向,当年就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孙中山在晚年作民族主义讲演时也多次指出:西方新的进步的知识,例如自然科学、技术等等,中国人都应当向人家学习,但中国在伦理方面有超过西方的地方,中国人的智慧较欧美人卓越。所以对西方的文化要进行分析,它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是糟粕应当进行清算和批判,但对传统文化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古脑儿地全盘抛掉,搞民族虚无主义。正确的态度是对传统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作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扬有弃。如果把民族传统都否定了,那就等于否定这个民族。要让传统消亡就等于要民族消亡,至少让这个民族的文化消亡。否定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那就等于把这个民族的一切精神财富剥夺了,把前进的基地铲平了,结果倒是轻松了,没有任何负担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这个民族必将变成一张白纸,真正“一无所有”,那么这个民族的山河乃至人心又将会如何?不说人们都会清楚的。其实,传统虽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好,但也决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坏。并且,不论情愿与否,传统终归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基础。只要我们不想让中华民族“解散”了、消

①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③ 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2号连载。

④ 庞朴:《传统与现代化》,《北京日报》,1986年2月10日。

⑤ 参见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台湾文星书店1964年版,第17—28页,第35—36页。